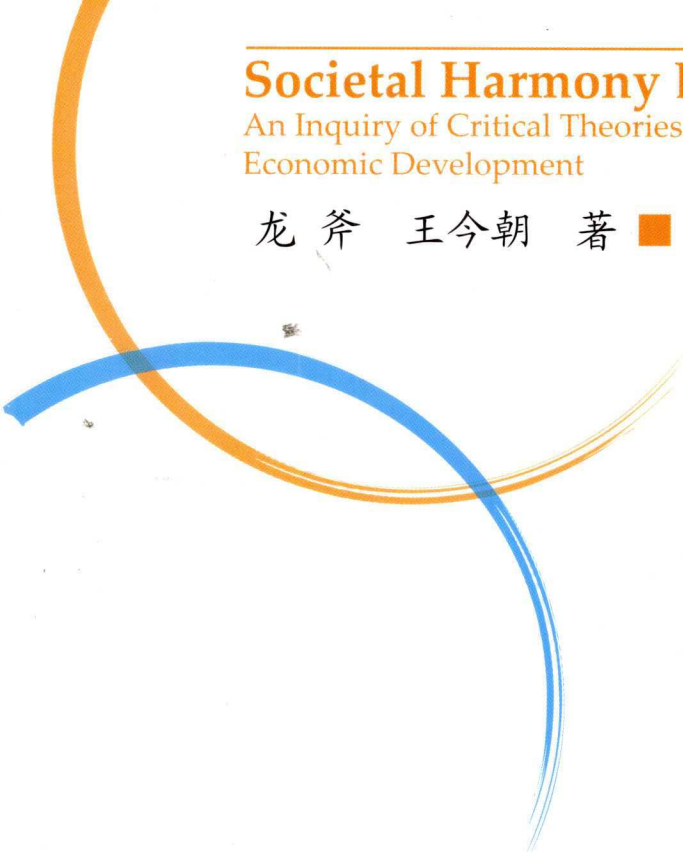




Societal Harmony Determinism

An Inquiry of Critical Theori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龙 斧 王今朝 著 ■

社会和谐决定论

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Societal Harmony Determinism
An Inquiry of Critical Theori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龙 斧 王今朝 著

社会和谐决定论

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
龙斧, 王今朝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97 - 2001 - 1

I. ①社… II. ①龙… ②王… III. ①经济发展 - 理论
研究 - 中国②社会发展 - 理论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
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620 号

社会和谐决定论

——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

著 者 / 龙 斧 王今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经理 / 周 丽 王玉水

责任编辑 / 张景增

责任校对 / 白秀红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

字 数 / 468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001 - 1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读 者

本书两位作者在中美两国大学学习、教学并从事科研共 50 余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 Syracuse 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东俄勒冈州立大学），不仅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会议上发表大量论文，并多次承担中美学术科研基金项目，而且在美国大学（包括著名的 Maxwell 研究院）开设、讲授 30 多门不同课程；不仅对中国社会有较深了解，而且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也有较深了解。这些了解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建立在教学、科研的长期严谨训练和对社会的深入调查、思考与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多个学科知识的全面学习和运用上的。尽管这一切为本书撰写打下殷实基础，作者依然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每一观点、每一命题、每一结论、每一分析都是经过交叉科学的论证和不同方法检验与约束的，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废话，没有一句信口开河、泛泛而论之言。这既是作者对自己的严律使然，也是对读者的尊重使然，更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使然。

对关心中国发展、命运、进步的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工作人员和干部这个中国“最广大人群”，本书是一个汇报。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 不断增长、高楼崛起、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同时存在大量新出现、新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现象、问题、矛盾、冲突，以及因此产生的思考、感叹、回忆、质问、迷惘、困惑、疑虑、不理解。本书正是对中国社会这些引起最广大人群直观反应、感觉的现象、问题、矛盾、冲突所做的科学分析、根源挖掘以及理论解释。毕竟，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思考的民族而不是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丧失自我的民族（本书丝毫没有反对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改善本身，这与军队搞懂为谁打仗、怎样打仗，但并不反

对改善武器装备的道理一样)。笔者之一曾在纽约碰到清华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他们感叹“美国这么富有、这么优越,真是比中国好太多了,以前我们都上当了”。他们的感受不是思考,而是简单化、肤浅的“直射反应”,也带有一点今天在中国仍大有市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了500年,而美国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优势、地理优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劳动力优势、生产力优势等等以及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即使其他西方国家也无法相比。仅仅经历了1949~1966年短短17年社会主义摸索、试验、探索发展的中国又怎能与之相比呢?是否这对教授夫妇也把庚子赔款产生的清华大学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缺桌少凳、仅有几名老师的农村小学相比呢?当然,本书不是为这一种人所作,而是为有客观、公正思考能力、不简单以个人经历沉浮来妄评社会是非的最广大社会人群所作,是为他们具体分析、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现象和矛盾所作。笔者之一还遇到这样一位大腹便便的民营老板,他一方面笑谈在工农雇佣劳动力身上赚钱(产生剩余价值)如何容易,又一方面极为赞同“少数人先富起来”,感叹“不然谁给这些劳动力提供生存的机会呢”!这种人在“只有资本主义(加上封建色彩)才能救中国”这一点上很直率。本书不是针对这种直率所作,而是针对那些与这种人的价值观、思想观、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一样却又带有伪装、颇有欺骗性的理论、观点而作。理论篇部分观点已由作者在过去几年内完成论证并发表,约占全书1/4的篇幅,而收入本书时又有所加强。方法篇则是“全新”分析,意在用科学方法剥掉这些“理论”的伪装,并对其欺骗加以分析、驳斥。读者完全可以略过书中的函数、公式、定量方法、数理模型(它们是在学术研究中表述规律性、普适性、严谨性等的手段、方法),书中的历史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阐述、论证等足以说明问题。

对热爱中国、关心国事的莘莘学子,本书是一个启发、支持、示范。首先,今天社会既有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也不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本书揭示,物质条件、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一个民族如果被物质欲淹没,被商业洪流吞噬,失去民族自我、方向自我、信仰自我、理论自我、实践自我,则无前途、进步可言。民族定位如此,个人也如此。毛泽东一代人在物质匮乏、生活贫简条件下,坚持上述自我,成功建立并建设了一个新中国,绝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所能比拟,更非诺贝尔所能望其项背。而这个“自我”离不开科学的思想观、方法论打造,离不开现代研究方法的学

习、素质的提高、功底的铺垫、能力的增强。本书对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分析以及对各种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如果能对年轻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有所启发、支持并予以示范，作者就如愿以偿。其次，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方向、性质和模式等问题上，年轻学子面对的既有国学传统，又有“西学东渐”，既有名流观点，又有世俗空谈，其中不乏颠倒历史、混淆黑白、肆意歪曲、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加上商业渗透、媒体渲染、市场炒作，难免鱼龙混杂、谬误百出。本书分析涉及大量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对历史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它也指出了大量理论谬误和方法误用，还理论与方法科学之身（比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责任制模式，60年代就试验商品经济生产，假设没有“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且中美实现了邦交，中国经济的科学、渐进、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开放将是必然的）。最后，本书的数理、定量方法使用并不构成理解的困难（所要求的不过是深谙函数这一基本概念和了解多元微分公式），文科学子一方面可从其结构、观点、命题所蕴涵的逻辑关系以及所运用的理论和实证方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在定量方法的学习、运用上有所受益。理工等科学子则可从本书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的特点、结构、模式。而本书所展示的交叉科学方法，对文、理学生未来无论是从事行政管理还是学术科研都大有裨益。

对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同人，本书是一个交流和商榷。由于体制等各种原因，今天既有为学历、学位、职称等而做的研究——这无可厚非，也有为仕途、为升迁、为名利的研究——虽不敢恭维却无须求全责备；而那些趋炎附势、迎奉口号、受意识形态驱使、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做的研究，难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胡乱捆绑、不顾研究方法、无视职业道德，既是学者生命的自杀，又是误人子弟，更是对社会和民族的犯罪。但无论何时何因，在“兴亡有责”的匹夫中，学者也应当仁不让。一个湖南师范的学生，其著作的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指导性和所产生的社会发展意义远超诺贝尔；一个读书几年、贫苦出身的中国军人，战胜了美国最著名军校的名将之花、望门之后。今天条件优越、时间充裕、数量众多的学者至少除了应景之作，也可对这种独特竞争优势加以效仿。因此，一方面，对那些以同等学术研究方式方法的善意批评、中肯指正、不同意见的坦诚交流和相反意见的严厉驳斥以及对本书观点的进一步研讨，笔者都以“一朝闻道”相待；另一方面，对那些一语定调、空洞笼统、具体问题不谈

却先歪曲、曲解原意再施“扣帽子、打棍子”之术的反映、评判、指画，笔者无暇顾及。

本书写作部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武汉市科技局研究基金、国家留学基金支持，特此致谢！笔者也感谢武汉大学为本书写作的支持，感谢武汉大学同人、同学为撰写本书给予大量思考食粮和帮助，尤其感谢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对本书撰写的巨大支持、鼓励和指点，没有他为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创造的条件、平台，本书的科研工作无法完成。同时，笔者也感谢印第安纳大学 Kelley 商学院和 Bruce Jaffee 教授对本书研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并感谢他和其他教授、专家围绕此书观点进行学术讨论时所给予的启发。笔者感谢几年来对发表我们文章做出努力的北京、西安、南京、长沙、长春、成都等地学术理论刊物的多位编辑。笔者尤其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与鼎助，他们为本书面世贡献殊多。笔者也感谢家人为了本书以及其他大量的相关工作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最后，笔者深深感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师长。他们无论是世界著名学者，还是普通小学教员，都共同打造了本书作者的素质、能力、责任感和知识结构。没有这些打造，本书无法产生。

本书所有文章都是在两位作者共同商讨、思考、研究、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文责共同承担，但两位作者在写作上又有分工侧重。具体而言，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七章至第十六章、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由龙斧主笔，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二十三章由王今朝主笔。欢迎来信来函（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430072）来邮（wusddc@126.com）批评指正。

序 言

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6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此倾注大量研究，论文不少于3.6万篇，著作不下450部。^①以平均每文5000字、每著20万字保守计算，总计2.7亿字。而涵盖1925~1949年共计24年的4卷《毛泽东选集》才不过66万余字。和谐社会研究耗费资源之大，是毛泽东撰写4卷著作的1636倍。如果考虑到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范围和时代条件、手段等差异性，和谐社会研究的资源耗费计为毛泽东研究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1636万倍也不为过（至于实际效果那就无法比较了）。然而，不少问题仍未很好解决，而有些仍需再做思考。为什么中国在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社会不和谐最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怎样科学衡量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同时，中国又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尤为如此。既然中国30年来GDP高速增长、总产值世界第三，为什么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呢？经济发展模式与和谐社会这一社会发展模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会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吗？社会的不和谐现象是否反映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呢？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定位、内涵确立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性、合理性、科学性产生影响吗？政府在中国社会和谐与否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本书正是针对这些依然未决的问题而作，正是针对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作，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作。因此，它看似社会和谐的研究，实为全面思考、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

① 根据2010年5月4日对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查询结果，正副题名中包含“和谐社会”一词的著作共计272部，而正副题名中包含“和谐”一词的著作共计899部。根据我们的鉴定，其中至少有一半可算是研究著作。

与方法之作。

一 本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认识

几亿文字的浩瀚研究中虽有一些启发之作，却不乏主观臆想的泛泛空谈——和谐包括哪些哪些，或和谐必须如何如何，也不乏牵强附会、逻辑混乱、随意延伸、肆意曲解、“领导发口号、学者加论证”的应景之作（见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显示其中存在不少思想观和方法论问题。思想观是对社会发展事物与现象的本质认识过程的出发点，方法论是认识过程所遵循的思维与分析模式。本书分为方法篇和理论篇两部分，其思考、分析和研究以如下六点基本思想观和方法论认识为基础。

第一，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是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的不和谐，否则不用也无须由中央提出并把它置于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因此，这个“和谐”既不是古今中外的和和气气、和睦相处，也不是人们日常相处时的“和为贵”（见本书第十四章）；既不是指中国的文化、家庭或个人身心需要和谐（见本书第十五章），也不是指孤立的人与自然和谐（尽管它们可能反映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本质性问题的某些方面）。这个和谐首先是指中国社会中以根本社会、经济、政治利益区分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是否在平等、公平、正义基础上达到和谐（见本书第四章至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三章）。因此，要研究“社会和谐”必须从社会不和谐入手，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社会不和谐现象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还会发生在不同领域。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某个现象严重了就处理一下，某个问题激化了就缓解一下，那它们就会此消彼长，处理、缓解尽管必要，但如果被这种割韭菜、救火灾式的机械社会论方法支配，投鼠忌器、首尾两端、进退维谷、瞻前顾后的行为在所难免，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和谐问题（见本书第四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二十三章）。不认识这一点，研究不从问题的表象中分析并揭示不和谐现象、带有共性的本质，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

第三，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模式绝非那种“经济是经济、社会是社会”

的关系（不少人试图用专业术语、理论概念、专业划分这种表面上的阳春白雪实际上的装腔作势、故弄深奥达到把二者分开的目的）。经济现象、行为、功能、运行机制有其自身规律性不假，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该社会发展方向、性质无法分开亦真。从人类社会发展共性看，任何国家的脱离经济利益关系的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产生和谐社会。而从特性看，一个国家的和谐构建如果不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关系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特性之上，不基于自身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资源、人口、社会制度特性以及因此产生的自身社会主导价值观基础之上（如照搬他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把本国带有自身特性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拜奉为自己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既无法产生一个符合自身国情的科学、合理、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无法产生和谐社会（见本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因此，正是这个经济利益关系把中国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本质、实践基础、发展根本上连接起来，成为探寻中国（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联结点。不认识这一点，社会和谐或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不主要或首先从这一联结点入手，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

第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谐，和谐与冲突是人类社会在矛盾中发展的对立统一（见本书第十章、第二十三章）。导致、引发社会不和谐（即冲突）的矛盾有多种。无论是构建和谐的相关理论还是具体实践，如果不抓住影响和谐的最主要社会矛盾，或用次要矛盾代替、掩盖、否认、淡化主要矛盾，即便某一次要矛盾得到缓解甚至解决，其他相同性质、本质的新矛盾还会因主要矛盾的存在而不断产生，得到解决的次要矛盾也会以不同方式、形式再次表现出来。比如，就经济利益关系产生的各种矛盾和表现形式而言，如果不从主要矛盾入手，即便一个矛盾或表现形式得到解决，反映不平等、不公平、非正义的矛盾还会以新形式出现，导致经济利益关系不平等、不公平、非正义的新政策、新规定、新条件、新环境（如对少数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资本新机遇和对雇佣劳动力的新剥削）还会出现（见本书第六章至第八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因此，再没有什么比抓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能够实现一个社会由不和谐向和谐转变。也因此，无论是对社会和谐的研究还是和谐理论内涵的确立应该首先针对、围绕引起不和谐的最主要社会矛盾，或揭示某一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房价过高还是贫富差别，无论是贪污

腐败还是两极分化，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资源利用，无论是社会和谐政策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等等），不认识这一点，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

第五，中国提出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中国60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摸索与尝试的60年。然而一些研究（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却通过移花接木把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变成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并通过形式与内容上的偷梁换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依靠“两个凡是”的方法论来维系这种“内涵”：即凡是不把“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与全面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利润化等同起来（或凡是对后者质疑、批判）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凡是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发展就是否定改革开放、走“回头路”。^①如果坚持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法论，那么分析中国社会的和谐现象、性质、根源就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对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面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与借鉴也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对那些表面高喊“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市场经济”而实为推崇“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伪科学进行质疑与批判就更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它们不仅不是否定，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对改革开放的肯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见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三章）。很明显，和谐社会或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如果在思想观上极端化，如果为达目的而不择“两个凡是”之手段^②，那么科学就被神学取代，研究也

① 至于什么性质的“回头路”却不说，也不敢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因为一经分析，其逻辑混乱、思想观的极端性和方法论的简单化本质就会暴露出来。

② 第二个“凡是”使用了一个障眼法——用方法上的简单化来掩盖思想观上的极端性，造成逻辑和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科学性的双重“短路”。这就是，为了论证“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才能救中国”（尽管表面上理论旗号因牵强附会、肆意曲解而五花八门），把“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局部产生的“大锅饭”、“没有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现象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本质。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个被今天某些观点歪曲、诋毁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把一个一穷二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资源匮乏、人口世界第一、生产力水平倒数、被他国比作没饭吃、社会基础经济设施等于零的社会，在1949~1966年短短17年中，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和较完备工业体系、初步现代经济基础的国家。世界上有这样的“大锅饭”吗？今天的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不区分“文化大革命”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计划经济不仅是学术基本方法功底的问题，更是一个要好全好、要坏全坏、昨天“越公越好”今天“越私越好”的极端主义思想观。关于这一点的分析，见本书第四章、第十九章等章。

就变成宗教式说教了。不认识这一点，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

第六，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必须“破”与“立”结合。只泛泛而谈应该怎样怎样，而避开为什么现在没有怎样、现在的问题怎样产生、影响和作用等，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一个理论的科学发展是在“破”与“立”的反复过程中逐步形成、不断完善的，科学的方法论本质就是如此。举凡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理论发展，从不回避对非科学、伪科学的观点、理论、思想的揭示和批判^①，因为后者要么代表某种既得利益，要么不符合理论科学性要求（见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第十二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要么掩盖真相、逻辑混乱、歪曲或回避事物本质，等等。本书正是坚持这种方法论，对当前影响力较大、代表性较高、错误较明显、谬误较突出的一些理论观点、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性、学术性、理论性、实证性质疑与驳斥，对象包括国内外权威机构、权威人士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如哈耶克的奴役论、弗里德曼的自由论、科尔奈的短缺论、罗尔斯的契约论，或中国科学院的“和谐指标”、上海的“和谐指数模式”和市场经济决定论、违背邓小平原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等。本书不仅从思想观角度予以分析，而且展现其因违反数理衡量的合理性、方法的适用性而陷入伪科学、假意识范畴，而我们的理论观点、论点、命题、模式的论证在这些质疑和驳斥中得到了科学性展现、巩固、加强。

在“破”的同时，我们也运用、引用、发挥（即“立”）了不少其他西方学者，如 Myrdal、Robinson、Durkheim、Manheim、Richman、伊莎白·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夫妇等人的理论、观点。本书的“破”，即对西方和国内权威机构/学者的某些理论的质疑与批判，不是说他们的所有理论、观点都有问题（当然，本书对代表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的逻辑批判是无情的），同样道理，本书引用某些西方和国内权威机构/学者的理论不等于说他们的所有理论都对。正是因为有“破”有“立”，“‘破’字当头，

① 如马克思有《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第四卷等；恩格斯有《反杜林论》、《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列宁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之一”和“之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等；毛泽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批判大汉族主义》等。

‘立’在其中”，对社会、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才具有“科学”和“发展”之性质。不认识这一点，就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

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建设角度讲，如果没有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认识作为基础，也就没有本书的诞生。思想观是出发点，差之毫厘必然导致理论的谬之千里。方法论是思维过程，缺乏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必然导致理论研究缺乏严谨性、科学性。围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如果缺乏这种严谨性、科学性，没有鲜明的价值观、世界观，不揭示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最本质性原因，不针对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不以改善中国经济利益关系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为目的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可能有任何建树。

二 本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认识

（一）中国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的“名副其实”问题

1. 理论内涵怎样科学确立

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指导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目的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即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手段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这三方面的统一，无论怎样宣称“马列”、“社会主义”都只能是名不副实。同时，一个社会还根据发展阶段提出与宏观指导理论、目的、手段相一致的阶段性指导理论。自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指导理论思想后，一些研究试图把它们信奉的理论或观点纳入其内涵。有的把“完善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的“充分必要条件”^①，也有的把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改善、传统文化弘扬、实行社会契约等作为中国和谐社会理论的内涵（见本书评市场经济决定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非线性关系，评中科院和谐指数，评上海指数模式、经济利益关系、无知之幕、资本属性、中国传统文化等文章）。而试图用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西方理论影响中国

① 即使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从辩证法角度看，从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基本常识看，“完善的市场经济”即“Perfect Market Economy”都不存在。

社会发展实际指导理论内涵的现象就更是不胜枚举了。那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到底应该怎样确立呢？本书理论篇第十章一方面对上述一些理论进行了解剖、分析和批判，指出它们在实质上与上述宏观理论、目的、手段的非一致性；另一方面，运用演绎、归纳和历史实证主义、比较研究、共性与特性分析以及要素选定法等方法，对中国社会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做了实证案例分析，首次提出社会发展指导理论内涵确立的科学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涵要素就是要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非此不为社会发展理论；非此经不起实践与时间检验；非此没有实际的社会指导意义）。这就为指导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未来其他理论的内涵确立、检验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科学标准。

2. 什么是理论要针对的主要社会矛盾

从上述中国社会发展宏观指导理论及其目的、手段看，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现阶段指导理论看，阻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经济发展不够快吗？是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吗？是缺乏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吗？是没有弘扬、继承传统文化吗？都不是。如果是，即便从逻辑上看，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怎样把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都无济于事。本书在运用交叉科学对中国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主要社会矛盾的15个表现方面（见本书第十一章）。这一分析与本书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决定变量的学术性论证分析（见本书中国“社会和谐”的数理理论与交叉科学检验的之一至之六）一起，以及与本书其他理论和实证分析一起，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方向、角度、领域打下了一定的科学性基础。尽管这些分析是否构成完整的矛盾结构、性质、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个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如果不抓住主要社会矛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注重矛盾某个表象而忽略矛盾共性实质，它的科学性、实际指导性就无从谈起。

3. 理论科学性怎样检验

一个理论之所以为社会发展指导理论，就是它指导该社会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各个社会功能领域的结构、运行方式、手段方法、政策制定等。而现在中国理论研究领域却时有本末倒置的现象出现，即当某个或某几个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机制、功能、手段被介绍或引进到中

国后，它们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指导理论，或经渲染干脆成为其内涵组成部分。它们要么披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衣，要么被定义为“中国特色”，要么干脆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等等。经此三法，一些明明是西方国家都批判、不齿的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西方学术理论界、教育界都不认可的“说法”，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鉴于其蔓延速度、影响程度、作用结果，鉴于中国今天社会和谐构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挑战，也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建设的需要，本书首次提出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科学性检验的五大标准，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如果缺乏与社会现状的对称性、对主要社会矛盾的针对性、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性等，一个独立的理论不仅无法成立而且科学性丧失。对于当前研究和谐社会的三大主要理论基础来源（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本书正是运用这五个科学标准加以研究；对于当前关于和谐社会内涵确立的种种错误观点，本书正是基于这五个科学标准加以研究；而本书提出的相关理论观点，如中国社会和谐的决定理论，资本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和谐与经济利益、社会主导价值观、社会心理状态的关系，社会契约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和谐与冲突的对立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也都是以这五个标准为检验依据的。

（二）社会发展指导理论与实践手段、实践结果的关系问题（即理论对实践的实际指导性问题）

对中国社会发展宏观理论指导性的检验首先、最主要的是宏观理论的目的（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与实践手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这一目的与实践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没有这两个一致性，宏观理论的指导性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从这一角度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1. 目的与实践手段的一致性

本书对当前的一些具体实践手段、政策、方法、行为、模式进行了历史实证主义检验和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案例分析，展示了它们与指导理论缺乏一致性，而且由于这些实践手段本身的决策科学性的缺乏，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性。比如，国退民进、出售转让政策既不符合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

的私有制改造=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可能不存在),也不符合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理论与目的。我们的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法律学分析揭示出这种实践手段甚至与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理论都不相符合(极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支配的理论除外),而且揭示出它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行为准则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对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导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即中国社会和谐三大决定变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当然,一些研究把这种对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成分中“为主”的公有制进行全面私有制改造牵强附会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试图使这种实践手段与目的一致起来。本书通过用逻辑推理、反证演绎、共性与特性分析等研究展示,按照这种方式的“实践归纳理论”以及产生的荒谬逻辑,人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美国化”、“英国化”、“法国化”,甚至“马克思主义封建贵族化、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化、殖民主义化”(见本书第四章)等。关于目的与手段一致性问题,当前另一种较为流行、颇有影响的观点就是,为了保证GDP、总产值增长速率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本书分析指出,这种观点通过偷梁换柱把手段变成目的、用手段损害目的,不仅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而且无视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按此逻辑,为了增长而采取法西斯、奴隶制、对外侵略都无可厚非,更不用说剥削压迫、榨取剩余价值了。^①同时,作为实证论证,本书对大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百废待兴、极为艰苦条件下保持目的与实践手段一致性的案例作了分析(如实现社会成员人人平等的基本经济地位保障、赎买政策、男女平等、“三高三低”、赤脚医生、“八字方针”、合作化、集体化、“十大关系”等)。

2. 目的与实践结果的一致性

实践结果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目的是否一致是对社会发展宏观理论指导性高低的衡量。本书研究、分析了那些与目的不相一致甚至恰恰相反、对中国社会和谐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问题和现象(即实践结果)。第一,本书用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心

^① 与“经济理论”相比,文学本来属于形象思维,可是,今天中国一些作品(如《亮剑》、《潜伏》、《英雄无名》、《蜗居》等)揭示出的社会问题深度却高于本应属于抽象思维的这些经济学分析。

理学、行为学等理论以及定性、计量和概率等方法，对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官官勾结、假公济私、拉帮结派、“近亲繁殖”、编织社会与经济利益网络等社会性行为进行的分析表明，它们所造成的实践结果与中国社会指导理论以及要达到的目的截然相反，并指出这些绝不是个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出现的结果。第二，本书还从政治经济学、社会行为学、心理学、法律学角度分析了一种“合法”现象，即不少政府官员（人民的公仆、指导理论的宣扬与捍卫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的带头人）一方面口头上可以高喊、弘扬指导理论；而另一方面在行为上却可以合法地、便捷地将各种有形无形国有资产、国有资金、资源作为个人私有利益交换的“资本”（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全法制”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指导性面临的挑战）。第三，本书对中国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产生的性质、原因、方式和结果也构成目的与实践手段、结果一致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揭示出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不只是家庭财产、工资收入差别，而主要是资本占有和被资本占有的差别——它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程度的变化。第四，本书还对其他实践结果与目的的一致性做了分析和研究，例如，①4种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悖的新“行为类型”（见本书第二十一章）；②28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避免社会、经济成本（见本书第二十二章）；③经济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所产生的引起社会主导价值观、社会心理变化的6种因素（见本书第七章）；④6种政府行为异化（见本书第七章、第九章）等。

本书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是社会主义，就是其经济制度的根基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如果社会科学研究得出了经济发展模式要依靠私有制的“大跃进”的结论，同时又得出了公有制无效率的结论，那就根本不是中国特色，也不是社会主义，而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目的就更是无从谈起了。这些结论要么反映了思想观上的极端性，要么代表了上位阶级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观，要么来源于方法论上的简单化，即近因、光环、启发性思维的影响（见本书第二十一章）。如果带有上层建筑性质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如果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私有化或正在由私有化转为国有化的领域（如医疗、教育、社保等），如果连西方许多国家都采取用国有制控制、调节私有制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领域（如